

八十年代世界经济 重要问题探索

吳紀先 周新民 主編
趙德寅 肖育才

责任编辑 曾德国

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 合编
美国经济学会武汉分会

一九八四年

FH
20
3

BN77727

目 录

1. 中加贸易：发展，问题与建议 赵德瀛 (3)
2. 襄樊经济区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初探 陈圣安、刘启明、王荣祖 (38)
3. 战后美国经济中积累的剖析 吴纪先、贾植园 (54)
4. 论战后美国固定资本投资的部门构成 贾植园 (74)
5. 从美国农业经济结构论我国农业
 经济的发展战略 黄永轼 (94)
6. 从美国政府反农业危机的措施看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干预 贾 健、卢晓蓉 (131)
7. 战后美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 陈毓华 (143)
8. 美国的建筑业 王 则 (165)
9. 战后美国财政金融政策初析 李世清 (174)
10. 苏美钢铁工业比较分析 隋启炎 (188)
11. 发达的农业 富庶的农村 刘钧谦 (208)
12. 对苏联大力推行农业集体承包制的初探 左东官 (234)
13. 对苏联农产品价格的理论与实践 陈洪博 (259)

14. 试论美日贸易摩擦 周茂荣(275)
15. 谈谈我国工资制度改革对提高经济效益
的作用——学习匈牙利工资改革(注)
札记 王新华(289)
16. 美元升值与美国高利率对欧洲货币
体系的影响 任映国(304)
17. 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与共同体
农业经济的发展 周新民(311)
18. 试论欧洲共同体的两重性 王启荣(349)
19. 论南南合作的战略意义与我国的对外
经济关系 肖育才(360)
20. 关于南方国家的对外贸易状况与战略
的分析 肖育才(372)
21. 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和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斗争 曹 阳(388)

中加贸易：发展，问题与建议

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赵德绩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政府有关机构和学术界对我国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得到广泛开发。然而，多数论著侧重于外贸的综合研究方面，而对按国别的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则甚为不足。至于对被称为“边缘”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中加经济贸易关系便是一例。

长期以来，加拿大工商界和学术界对中加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的视线，通常也集中在美、欧以及日本。作者在加拿大期间，在全加高等学府中最负盛名的多伦多大学约翰·罗巴茨科研图书馆 (John-P. Robarts Research Library) 查遍藏书目录和参考文献，关于系统地专门研究该课题的著作，也只找到七十年代初由加拿大私人计划协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加拿大经济政策委员会创议的一项研究成果：《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格局与展望》，可谓凤毛麟角，独一无二！除此之外，只发现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在其它标题的书籍中有个别章节极其简单地论及此题。例如，Arthur A. Stahnke编辑的《中国与西方的贸

易：政治与经济分析》一书，只辟一章分析中加贸易，而且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的，其章题是“加中贸易的政治透视”。作者为Henry S·Albinski和F·Conrad Raabe。

如果说，加拿大方面早年对此问题注意甚为不够的话，那么近年来应该说情况已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随着“太平洋圈”（Pacific Rim）概念的发展，促进中加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不论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商界或学术界，都开始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政府出版物和报章杂志上关于加中经济贸易关系问题的报道与讨论逐渐增多。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有约翰·柯蒂斯博士刊登于《政策选择》杂志的“中国贸易”一文。同时，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创办了《中国导报》双月刊，对加中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最新进展，更进行定期、系统的专门报道和分析。

作者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关于现代东亚问题联合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该中心的研究计划，承担中加经济贸易关系项目的研究。在该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作者感到，自我国开放政策施行以来，中加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形势喜人；但同时中加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存在着一些令人关心的问题，亟需予以突破。否则，中加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长足发展，会是十分艰难的。迄今为止，大部分加拿大学者预测，加中经济贸易关系今后会进一步发展，但前景规模不会很大。加中贸易理事会作了许多努力促进改变这一不太乐观的看法，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很难说已有多大收效。作者拟参考中加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结合近几年来这种关系的新发展，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解决当前障碍中加经济贸易关

系进一步发展的难题，有所裨益。

(二) 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在两国经济中的地位

就经济发展水平说，加拿大属西方七强之列，是发达的工农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只需简单地指出如下事实就够了：第一，加拿大境内有数额巨大的外国资本投资，就单个国家进行比较，加拿大是世界上外国私人长期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外国投资对加拿大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确实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自由涌入，外国所有权的急剧膨胀，也带来了一些需要认真对付的问题。另一方面，加拿大在国外也有大量投资，据统计，到1977年，加拿大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已达130多亿加元。第二，加拿大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高达四分之一左右，比许多其它工业发达国家都高。如果就工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来看，对外贸易占物质产品产量的比重，就更高得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过程，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首先，就对外贸易而言，几十年来，进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调剂了市场供应，满足了人民生

活某些方面的需要。但是，从根本上说，过去由于多种因素（包括本国生产水平、政策变动和国际环境等）的影响，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远未占到应有的高度。据统计，1977年，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只有0.7%^①，同建国初期比较，没有太大变化。同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九位，而出口在世界出口额中居第三十六位^②，显然很不相称。至于出口额占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还不到3%^③，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同一指标。其次，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其它方面，如引进外国资金方面，更被视为禁区，扼杀了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任何可能进展，使中国坐失了通过国际合作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良机。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基本是一种闭关自守的经济，转而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不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慎重选定的战略决策。自那以来，它给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面貌。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开始得到真正的重视。一方面，积极慎重地引进一批外资；另一方面，努力扩展对外贸易。从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中，按美元计算，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增加了1.87倍，进口贸易额增长了2倍。对外贸易的扩大，对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表1—1 中国进出口贸易额④ (单位:十亿美元)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出 口	7.52	9.96	13.61	18.18	21.56
进 口	7.15	11.13	15.69	19.45	21.57
总 计	14.67	21.09	29.30	37.63	43.13

关于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这里应该着重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发生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发展。作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一年多来，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外贸理论工作者，在外贸理论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提出了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所不敢触及的新见解，即提出了利用国际分工和比较成本学说的“合理内核”问题，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讨论。他们主张，要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把对外贸易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状况，利用国际分工和比较成本说的合理内核，恰当地估价贸易保护的作用，重视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盈利性原则，合理安排进出口商品结构计划，改变生产什么就出口什么和凡是国内能生产的就少进口或不进口的传统观念，争取节约社会劳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贸易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作用⑤。另一些学者，对此见解持否定态度⑥，还有一些学者则取中间态度⑦。总之，关于对外贸易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中国正在展开一场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 中加贸易关系的历史发展

加中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年代，加中两国之间就已有双边贸易往来。不过，由于两国国内和国际间的具体条件，直到五十年代末，加中贸易仍只限于很小规模，除个别年分外，双边贸易额都只局限在几百万加元的范围之内。

六十年代初，中国较大规模地购买加拿大小麦，使双边贸易额第一次猛增到一亿加元以上。1966年，贸易额达到六十年代的最高峰，突破2亿加元。

1970年中加两国正式建交，为两国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从此，双边贸易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73年，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贸易协定，为期三年，以后又多次延长。按照协定，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成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促进双边贸易顺利发展。委员会每年召开，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交流情况，探讨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出建议。

迄今为止，在中加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史中，值得给予最大重视的因素是1976—197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巨大变化。“四人帮”的垮台，极左路线的被清算，四个现代化建设纲领的确认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这一切变化对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包括中加经济贸易关系正在和必将发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1978年以来中加经济贸易关系的进展，就是这些变化的反映；本世纪今后十多年和

下一世纪初中加经济贸易的发展，更将深刻地受这些变化的影响。

1978年总部设于多伦多市的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宣告成立，随后又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处。该理事会的成立，使得中国同加拿大最大的公司之间建立起一座重要的联系桥梁，从而对中加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979年，中加经济贸易协定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并产生了一个中加经济合作议定书。议定书确定加拿大可以在中国的农业、林业、轻工业、通讯、水火电站、石油和煤炭开采以及黑色与有色金属等领域作出贡献。

同年，加拿大政府机构“出口发展公司”给予中国银行20亿美元的买方信贷。加拿大方面本来预期这笔贷款将被用于购买加拿大物品，特别是发电厂、机器、高精尖电讯设备、运输和采矿设备等。但贷款实际动用极少。据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加拿大公司的竞争条件弱于日本与西欧国家。

1980年1月，加拿大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使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可比一般税率减低 $1/3$ 以上。但是，由于中国对加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被排除在普惠制待遇之外，因而实际受惠不大。

1981年加拿大政府宣布中国为重点经济合作对象，决定从该年起的五年中，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向中国提供8千万加元援助，在农业、林业、能源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同中国开展广泛的合作，包括帮助中国培养工商管理人才。

与上述诸项发展的同时，这几年，两国政府部长、高级官员、代表团经常互访，都是为促进中加经济贸易关系向更

高阶段发展所作出的许多努力。

经济、商业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学者访问与交流，近年也逐渐得到重视。一批商业专业的中国学生在里贾那大学学习。1982年中国高级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同年8月，多伦多大学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到中国经济特区和其它重要城市进行了学术考察访问。12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7名教授访问中国，并就管理方法、城市发展、城市交通、国际销售与金融、外汇和先进生产管理法等方面作了演讲。目前8所中国大学已被选定为管理训练中心，并与8所加拿大工商学院建立了固定关系^③。1983年1月多伦多大学还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同有关中国高等院校商定交流、培训事项。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加贸易获得稳步发展。1980年，双边贸易额打破10亿加元纪录，1981年再增至12亿加元。据加拿大官方估计，1982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14亿加元。可以说，中加两国贸易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然而，中加经济贸易关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加拿大相对地位的变化问题，两国贸易的商品构成问题，贸易差额问题以及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虽然就中加两国贸易增长速度本身来看并不算慢，但如果与其它发达国家同中国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较，加拿大则显得落于人后了。1977—80年，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加拿大的增长速度慢于美国、意大利、西德、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居第七位；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拿大也分别慢于意大利、日本、法国、西德、英国和美国，也居第七

位⑨。加拿大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也已由1977年的6.4%降到1979年的4.0%⑩。

加拿大相对地位的下降，同其它发达国家近几年大力扩展对中国的贸易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加拿大对除了直接贸易往来以外的其它经济关系参加不力。

中加贸易的商品构成，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但考察20多年来的中加贸易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变化不免过于缓慢。贸易双方的商品构成，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小麦始终占极大比重，六十年代占90%以上，七十年代有所下降，仍占80%以上，直到1981年仍占接近70%。中国有10亿人口，需要进口粮食，这是事实。中国是粮食净进口国，三十年来中国从国外进口粮食共11,425.6万吨，出口6,878.7万吨，两项相抵，净进口4,546.9万吨⑪。然而，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食物构成的未来变化（这当然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但这个过程毕竟是终究要实现的），加拿大靠小麦为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发展前景如何是值得考虑的。一些学者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警告：“加中贸易量将会继续增加，然而，要保持自己在中国外贸总额中占2—3%的份额，加拿大就必须使它出口商品的品种多样化，而不能单靠小麦。”⑫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商品构成也存在类似性质的问题。农副产品和纺织品与服装是中国输出的最主要项目，1980年占输出总额的近70%。纺织品中，宽幅棉布和混纺布两项就占90%，高档纺织品数量很少，例如毛呢只占6%⑬。从中国的生产能力来看，今后这几类大宗产品仍然要增加出口。但

是靠极少数品种输出，而且其中的最大项又受配额控制，加上服装与纺织品正面临其它国家和地区产品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在扩大输出传统商品的同时，努力扩大出口品种，以争取出口贸易额有较大规模的增长。最近两年，在加方的合作下，向加拿大出口普通机床、飞机部件等新产品获得成功，是喜人的新进展，应当继续努力，在出口商品多样化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四) 差额问题分析

加拿大——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问题，存在已久。下面将要引用的数字，揭示了一个引人兴趣和密切关注的现象，这个现象反映出一个几乎是带规律性的趋势。

在五十年代的多数年份中，中国——加拿大的贸易，表现出中国方面拥有少量顺差，大约波动在一百万到三百万加元之间。那个时期，加中之间的贸易额，当然是很小的。从六十年代起，情况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从1960年到1981年的21个年头中，中国方面年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额趋于越来越大。1961年是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随着加中贸易额第一次超过一亿加元，中国方面的贸易逆差也由1960年的仅仅3.1百万加元骤然升高，也第一次达到了一亿加元。在整个六十年代，中国方面的逆差，除个别年份外，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下。第二个转折点是1978年，中国方面的逆差额超过4亿加元，而1980年和1981年更高达7亿加元以上。（见表2—1）

表2—1 中国——加拿大贸易差额 (单位: 百万加元)⑯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差 额
1959	4.84	1.72	3.12
1960	5.64	8.74	-3.10
1961	3.23	122.84	-119.61
1962	4.52	147.44	-142.92
1963	5.12	104.74	-99.59
1964	9.37	136.26	-126.89
1965	14.44	105.13	-110.68
1966	20.59	184.88	-165.28
1967	25.07	91.31	-66.23
1968	23.44	163.24	-139.80
1969	27.42	122.42	-95.00
1970	20.43	141.99	-121.56
1971	33.30	204.05	-170.75
1972	48.38	260.68	-212.30
1973	52.90	272.29	-219.39
1974	61.35	437.95	-376.60
1975	56.33	376.42	-320.09
1976	88.37	195.94	-107.57
1977	82.15	369.15	-287.00
1978	94.60	503.43	-408.83
1979	167.45	596.11	-428.66
1980	154.91	866.42	-711.51
1981	220.01	1,004.82	-784.81
1982	203.65	1,229.45	-1,025.80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方面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随着中加贸易额的每一次大的增加，就带来中国方面逆差额的剧增。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扩大，是靠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而实现的。至少按照过去二十年中加贸易史来看，这种规律性趋势是的的确确存在的。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结果会怎样？如果今后中加贸易的进一步扩大，也总是带来中方逆差的再一次突破性记录，这种贸易能健康发展吗？

中国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的对加贸易逆差，实际上削弱了中国的进口能力，抑制了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它终将成为阻挠中加贸易大踏步前进的障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切。

其实，中国对加的贸易逆差问题，还在早期阶段，就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早在 1967 年波林·留英先生就曾指出：“对主要粮食供应国的巨额贸易差额，必将使北京政府感到极度困恼，而且当中国开始向西欧国家和日本偿付购买整套工厂的贷款后，这种逆差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困恼会更加严重。”^⑯

近年，随着中国对加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不少关心中加贸易健康发展的人士也一再地呼吁加拿大方面要理解和重视这个问题，设法予以调整。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Canada-China Trade Council）执行主席寇伟义先生最近指出：“我们应当理解中国对我们两国之间持久存在的不平衡贸易问题的关切。我们在缩小贸易差额方面的种种努力，将有助于让中国人看到，我们也是信奉双边贸易原则的。

这些努力也将会提高加拿大的产品和服务在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⑯

《中国贸易》一文的作者也明确说道：“限制加中贸易的主要因素是加拿大对中国的贸易盈余。……减少这种不平衡的机制必须得到考虑。”^⑰

问题十分明显，并已得到公认。中加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妥善处理贸易差额问题，以促进中加贸易不断健康发展。

通常情况下，调整国与国之间贸易逆差的主要途径有：三角或多边清算；借入资金抵销贸易逆差；压缩进口；扩大出口。作者拟对此逐一分析，试图找出调整中加贸易差额的较佳方案。

1、三角或多边清算。关于中国对加贸易逆差的调整办法问题，在国外常常听到的一种建议是，中国方面不必为此忧虑，可以通过三角或多边清算，维持贸易差额的总的平衡。亦即中国可以用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抵销对加拿大及另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使贸易差额保持平衡。这当然是一种途径。而且，事实上，过去的许多年中，中国也在运用这一途径，进行贸易差额调整的。例如，1977年，中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国、西德、法国以及阿根廷的23亿多美元的逆差，就是靠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更大顺差来抵销的。

但是，应当看到，对于平衡贸易差额说来，这一办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奏效。当一国对外贸易的顺差总额与逆差总额基本一致而且顺差都是可动用的自由外汇的条件下，三角或多边清算才能发挥以盈补亏，从而保持平衡的作用。

表2—2 1977年中国贸易差额 (单位: 百万美元)⑯

国 别	差 额	国 别	差 额
加拿大	-380.6	阿根 廷	-115.3
澳大利亚	-417.0	马来西亚	838.7
日本	-751.8	新加 坡	126.0
法 国	-137.7	香 港	1,777.1
西 德	-269.0	朝 鲜	80.0
英 国	-252.5	科威特	73.6

如果顺差总额低于逆差总额，多边清算抵销的结果，差额仍难达到平衡。中国前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从1978年起的连续三、四年中，中国的外贸收支出现大量的净逆差。在那种情况下，多边清算已不能成为恢复中国贸易差额平衡的手段。

中国经济经过调整，虽然1982年以来对外贸易获得较大顺差，但由于可动用的自由外汇并不以同等规模增长，因而，以账面顺差额弥补账面逆差额的解决办法依然受到局限。

采用多边清算，还存在另一问题。A国以对B国的顺差抵销C国的逆差，那么B国就要有对D国或E国的顺差来抵销其对A国的逆差，依此类推，才能保持总的差额平衡。否则A国就会受到来自B国的压力。可是，假设中国是A国，中国怎能保证自己的逆差国（如B国以及依此类推C国、D国、E国……等等）都能够拥有足够的顺差呢？当前的情况恰恰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由于旧的国际经济